

【里书外】

在现实和诗性之间徘徊

——读刘醒龙小说集《女性的战争》

祁泽宇

20世纪80年代,张承志、韩少功、阿城等作家都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交叉风行的潮流中,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,相较他们,刘醒龙的短篇小说似乎没有在文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笔。而实际上阅读《女性的战争》可以发现,刘醒龙早在创作之初就不动声色地积蓄力量,特别是以十个短篇组成的“大别山之谜”,以前后相连的民间传奇故事为主干,写尽了上千年自然经济所存留的农业文明基因。

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,《女性的战争》氤氲着楚地巫骚格调和大别山神秘瑰丽的氛围,它浪漫空灵地游离于人们记忆中的传统文化之外,更与今天主流的“文明社会”大相径庭。“大别山之谜”所表现的阴森瑰丽、人事万物、巫性传统,无不呈现着超然奇崛的美学风气。对这些各色民俗景象的出色描绘是小说集的一大突出成就。

面对这样一个浑朴自然的民间世界,刘醒龙把地痞流氓、刁民泼妇、英雄好汉统统写进小说,集束起生命欲望与社会道德的各类冲突,激发出民间意识中最原始最有力量因素。作家以纯净的眼光打量着这片土地,裹挟着极少受外界影响的乡土文化基因,纵使这其中不乏残酷与愚昧,依然希望用美清除丑,用善包容恶,文字中洋溢着“纯文学”的明快。

《女性的战争》中收录的多数作品都具备

超前的“叙事意识”,诸如《戒指》《双卡,双卡》,它们的情节半半拉拉,也没有一锤定音的结局,支撑文本的是小说内部的叙事。针对现实,作品有着缤纷的色彩和复杂的节奏,它们是边缘,是临界,夹在虚构与真实之间,叙事便显得不再肤浅。

刘醒龙依靠精确的语言,灵巧的叙述,创造出留有个人印记的文学符号。《山那边》讲几个青年的生活故事,结合隐喻指向,梦境与未知减弱了前因与后果的关联,青年始终处于恍惚的状态之中。对当时文坛而言,这是一种创新,刘醒龙刻意淡化主题,打散故事,展现叙事切片,情节的断裂不似先锋文学那样的语言、形式变革,而是在跳跃中发展故事,构筑了一个丰富的立体空间。

《女性的战争》所收录的二十七个短篇小说,每篇不过数千字篇幅,作者却写得张弛有度。他删除了介入式的情怀干扰,也去掉了过于浓密的情感宣泄,转而依靠精确的描绘以及对情节的精心设置,充分发挥“中介物”的艺术功效。如《翡翠画儿》里的翡翠陶脸,在与竹子相关的记忆里勾连着邓福的不甘与恨意,当翡翠与画儿相结合后,画儿与邓福都不惜以自我牺牲的方式互相拯救。

《女性的战争》有着旗帜鲜明的双重指向,一部分是以“大别山之谜”为代表的“寻根”式的民间书写,另一部分则是以《汽车不敢撞人》《冒牌城市》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题材。

刘醒龙在《现实主义与“现时主义”》一文中说“作为一种精神,‘现实主义’本应表现的更多的真的来源于生活,来源于普通人中间的内容。”当刘醒龙窥得现实主义文学本身的奥义后,他克制住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,并从“潮流化”的惯性中挣脱出来,把目光移向社会转型期的改革和在改革进程中的苦与乐、悲与喜。这些作品肩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感,为他后续的《凤凰琴》《分享艰难》等重大社会题材作品的创作奠定了基础。

可以看出,刘醒龙将小说的生活化作一种内在追求,他在最为基本的生产生活中探索小说写作的可能性。而此时支撑作品的不是别的,正是镌刻在生活铅华之中的主体性体验。《麦芒》《黑爹》《绿崖》以质朴的写实为基质,又糅入具有传奇性的乡土故事,使小说拥有足够的情节张力,这样的文本可信又可读。同时,刘醒龙也试图从自然中吸纳生命的能量来丰富民间世界,突破晦暗的底层生活,给主人公以尊严和力量。

《女性的战争》体现着作者风格未定时在现实和诗性之间摇摆不定的样态,他的民间性书写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潮流形成合题,并表现出一定的水准。但令他难以接受的是,寻根文学对负面因素的过度沉溺,文学的大别山对他而言是情感难以企及之地,当作家的想象力所不及及时,他坚定地以现实转向为支点。与其说这是刘醒龙风格的转换,不如说这是他

回归内心真实的表现,《谁家姑娘》《女性的战争》等作品虽然不像“大别山之谜”那样纯粹、风情化,却多了真的渲染,成就出了一种未经雕琢的朴实感。

一篇好的小说,应当是作家处心积虑的精心结撰。对刘醒龙而言,《女性的战争》,有其创作、人生道路上的五味杂陈,甚至说它们构成了一种对于生活的复杂“还原”,它们以形而下的本然世界,召唤着刘醒龙走向更广阔的文学天地。

（《女性的战争》,刘醒龙 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

王嘉

对艺术的认知和研究不存在学科边界,任何角度的涉足,都会给艺术带来新的话题。《金粉传奇——粉末冶金与人类文明》一书,尽管不是专门研究艺术的,但其中的部分章节,却也刷新了读者对艺术的好奇。

该书的作者来自两个团队,一个是材料专家刘咏教授,长期从事粉末冶金新材料和新技术相关的研究与开发,一个是诗词学者杨雨教授,主攻方向为唐宋词研究及批评。该书从学科跨界的立场,重新审视了材料学前提下的人文艺术。这让人联想到2003年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的邓乔彬教授的《古代艺术的文化观照》。如果说前者还是在“文科”的语境下,对传统文化展开的全方位回顾与探索;那么,后者则是在“新文科”的语境下,把理工科的学术成果纳入当下文化研究并加以以前瞻。

艺术,离不开材料。作为视觉文化的艺术产品,从生产到传播都依赖于相关的物质材料。《金粉传奇》所探讨的陶瓷技术、炼铁技术、化学制粉技术、增塑成型技术与文房四宝、古今文玩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。特别是书中第三章直接讨论了古人的制墨技术和墨文化,从材料科学的立场描述了文人书画家最熟悉的物件。其中提到的无定型碳、碳原子结晶化、非晶形态、纳米碳粉、化学气相沉积、物理气相沉积等理工科的专业术语,不仅为艺术专业的从业者开启了一扇重新认识墨业和墨汁的新角度,而且对理工科的材料业也是一个启迪。书中谈到古人松烟墨制作的关键步骤“炼烟”,“其工艺和原理与气相沉积制备粉末法有相似之处”。

言外之意,传统工艺的文化产品,一旦换成现代科技的理论知识和技术方式加以重新解读的时候,那些曾经被认为只属于古代和古人的东西,就会变得与当今的知识体系息息相关。文科和理工科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鸿沟,用现代科技破解古人工艺,进而延伸出更多的文化产品,或许不仅是多出几篇论文、多带几个学生,而是直接打开了一片新的产品市场。

对材料的关注,一直以来也是书画研究中的重要话题。以墨为例,艺术市场上走俏的书画作品,除了自身的艺术水准要达到相应的高度,以及风格、审美、技巧等因素之外,墨色的运用甚至墨的品质本身,常常也有着重要的作用。书画精品,在颜料和墨的品质方面,常常也有着近乎苛刻的追求。

有经验的朋友经常说,某某书画作品,一看那墨的品质不够档次,就肯定不会买,画得再好也没用,存不住。而书画精品,曾经有人把书画材料分为水性和油性,这只是为一种较为粗略的划分方式。对不同的新材料的综合使用,早就不是什么秘密。当我们很多画家还执着于“纸本水墨”“纸本设色”的时候,越来越多的画家已经开始了绘画作品对“综合材料”的探索与运用。墨也是如此,如果我们对于“墨的前今生”加以探讨,那么最直接的话题就是,如何运用今人的科技知识,对长久以来的古人的传统工艺加以升级,从而为书画家提供更为丰富多样的颜料。

通过当今的粉末冶金技术,如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,对于相关的从业人员而言,那将是一片蓝海。

（《金粉传奇——粉末冶金与人类文明》,刘咏、习婷、杨雨 编著,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）

艺术与材料科学

【走马观书】



《记忆之城》
袁凌 著,花城出版社

袁凌很可能是国内最优秀的非虚构写作作家,如果你看过《生死课》《寂静的孩子》《青苔不会消失》这几本书,应该会把“很可能”这三个字拿掉。如果袁凌来写小说呢?于是就有了这本《记忆之城》。这本书写了一个“我”与“鱼城”的故事,在这本书里,你会分不清重庆与“鱼城”的关系,分不清袁凌与“我”的关系,分不清非虚构与虚构的关系,但你可能也不想分清,只想安然待在袁凌给你建构的世界中,和他一起悲悯,一起愤怒,一起琐碎,一起隐忍,一起克制情感。

一个有趣的读法是,书中一些描写在袁凌的非虚构作品中也隐约出现过,比如重庆著名的那座“红卫兵墓”。袁凌在书中可能只是原型之一,但就像他的所有作品一样,小人物才是真正的主角,他们在冷酷却又奔腾的大时代中挣扎地告别着记忆。



《消失的真实:现代社会的思想困境》
金观涛 著,中信出版集团

以四十年或1978年至今为期限,金观涛可能是唯一一个从头至尾都保持了巨大影响力的学者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的思考和研究与其说追随时代、与时俱进,不如说针对自我、反复拷问。梁启超所谓“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”的思想姿态,在他身上得到了忠实印证——当然,他的自我之战,不是否定,而是超越,因此之故,他在古稀之年,依然有勇气(书中谦称“从康德那里获得勇气”)直面挑战新问题。这个新问题,乃是现代性的元问题,即现代社会的真实性问题。

作者在序言结尾呼唤道:“我们用一生提出的问题,随着自己这一代人的消失而中止吗?我希望从青年一代中听到回答。”这正构成了我们推荐此书的最大理由。另说一句,人有老少,思想则不分老少,愿思想家金观涛的头脑永远年轻,思想之树长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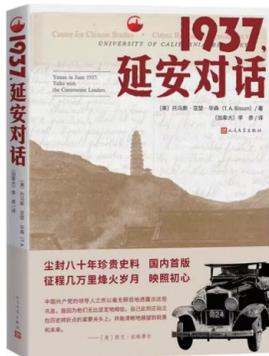
【我写我书】

托马斯·亚瑟·毕森

这部简短论著的资料来源于两个小小的笔记本。当初,我是用铅笔做的记录。好在岁月一晃,几十年过去了,如今字迹却依旧清晰可见,正如书中所附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。

笔记本之一,记录了我们在往返延安旅途中的所见所闻,包括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。另外一本笔记,则是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时的当场记录。

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,我曾辗转流



【读有所得】

税务风云与人性善恶的真情再现

——谈谈长篇小说《生命线》

王英姿

税收是国家财政总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,也是维系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。在长篇小说《生命线》中,作者谢枚琼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背景,以民众生疏的税收隐形战争为主要线索,将残酷战争、战争中的人性及税收历史融为一体,在从容不迫又饱含深情的叙述中,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为人知、从无到有的中国共产党的税收创业图景。

本我与超我的对峙

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,完整的人格结构由三大部分组成,即本我、自我和超我。如果说本我是一个人最原始的欲望,那超我就是我们的内在道德,或者说作为人,对真善美的向往,而自我则是二者间的平衡者。

《生命线》在党的税务创业的艰难进程中,展现了一大批人物群像,通过对他们在本我与超我对峙中的不同抉择的叙述,凸显出了人性的善恶。

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,在潇浦县税务稽征分局成立、发展的过程中,有人加入有人反叛。“忠诚者”不仅有偏向“超我”的正义坚守者;以蓝子天、秦瑾等人为代表的先进共产党人;更有沦陷“本我”的邪恶固守者;二江兄弟等国民党亲日派;“背叛者”在“本我”与“超我”的对峙中固然有“弃明投暗”的堕落黑暗者;喻大江、周福光等党内腐败分子;也不乏“弃暗投明”的向往光明者;秦人简、毕渭民等爱国人士。

随着人物在“本我”与“超我”中的摆动,读者也似乎跟着人物在抉择。在“本我”与“超我”的对峙中,大千世界里人性的善

恶尽显作者笔端。

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统一

《生命线》将人物置于国家危亡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之下,再现了共产党人在战争过程中与人民相依相存的画面,以及共产党人不断在实践中完善政策的过程。

小说并未直接描写正面战场,而是取幕后税务战争这一点展开叙述,但从这个隐形战场中我们就已窥得战争的残酷性。战争爆发受苦的最终是人民,而作者对人民的关心无不彰显于字里行间。蓝子天等一派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“坏时代”里,始终坚守原则,捍卫“善”的底线,把维护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。

百姓将民族解放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身上,共产党将使命扛在肩上,将人民的美好愿景放在心上。在这野蛮的屠宰场上,还是有些文明微光存在的,就是人性。这份对“善”的追求穿越漫长光年,依旧闪耀在今日。

小说虽是虚构的情节却给人“真”的历史感受,尽显作者笔下对人民的真情和人文关怀,对“善”的礼赞与“真”的追求,是“人文关怀”与“历史理性”的和谐统一。

寻根与展望的融合

《生命线》将故事发生地放置在抗战时期的江南小镇——潇浦,还原了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“生命线”所扎根的文化土壤,展望辽阔未来的宏大图景。

作者谢枚琼是一位资深的税务工作者,多年的基层税务工作实践、长期的文学创作经验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有力支撑,但他的创作源泉还是那植根于他内心深处



的湖湘文化以及他在这片土地上所获得的深厚的生活积淀。

小说中夹杂着许多湖南方言,乡土气息浓厚,并且小说人物的生活经验也充满湖湘特色,而这无一不是作者对乡土的深情描绘,让读者得以看见在战火之外依然存在着乡村温情。

让人感动的不只是这片土地上的生活俗事,还有存在于其深层的精神文化力量。谢枚琼深挖抗日游击队“生命线”所扎根的文化土壤中深层的精神底蕴,向内“寻根”,凝练出这一有情有义、有血有肉的创业史的税收领域优秀作品。

《生命线》以一种明亮斑驳的激情书写了一首税务事业的时代赞歌,一大批税收英雄形象跃然纸上。作者正是通过对时代的书写,对历史的追溯,激励着我们从历史的余温中汲取前行的力量,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的奋力前行!

（《生命线》,谢枚琼 著,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）

